

吴欢章



新时代歌手

——论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的诗

7,25

宁夏人民出版社

新 时 代 歌 手

吴 欢 章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08千 插页: 1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227-00040-0/1·9

统一书号: 10157·244

定 价: 0.90元

目 次

应该正确对待我国当代诗歌的革命

现实主义传统（代序）	（ 1 ）
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的艺术道路	（ 21 ）
贺敬之诗歌的抒情艺术	（ 42 ）
郭小川抒情诗的美学特征	（ 72 ）
郭小川的叙事长诗	（ 99 ）
闻捷抒情诗的艺术风格	（ 126 ）
闻捷的叙事长诗	（ 139 ）
跋	（ 156 ）

应该正确对待我国当代诗歌 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代序）

我国当代诗歌曾经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它给我们提给的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当我们跨入历史新时期以后，理应认真回顾我国当代诗歌的历史行程，对它的经验和教训给以科学的总结。清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目前正在热烈展开的关于我国新诗发展方向的讨论，就是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情。要对我国当代诗歌的经验教训进行正确的总结，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我国当代的诗歌创作，除了十年浩劫中留下一片空白以外，在前十七年里虽然存在着“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但许多优秀的诗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仍然坚持了“五四”以来我国新诗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他们的创作曾经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承不承认新中国头十七年中诗歌创作确实取得的巨大成绩，要不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当代诗歌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应该具有鲜明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缺乏分析地、简单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诗与生活的关系，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诗歌创作的成败。历来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是强调“诗歌是生活的表现”（别林斯基），诗歌是“世界的回声”（高尔基）。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从诗的历史来看，这些论断确实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新中国头十七年的诗歌创作，就其主流来看，应该说是正确地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则，坚持了诗歌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五星红旗的升起，标志着一个新社会的诞生。诗人们为了熟悉和表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纷纷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投身于建设和保卫新生活的激流。李季先后深入玉门油矿和大庆油田，阮章竞到了塞外的包钢，未央走上抗美援朝的前线，邵燕祥借新闻工作之便广泛访问工厂、矿山和建设工程，郭小川则满怀战士的豪情漫游祖国的东南西北；同时从新中国的各个建设岗位上，也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劳动者诗人，如刘镇、黄声孝、李学鳌、孙友田、郑成义、王老九等等。总之，哪里有火热的生活，哪里就出现诗人的足迹；哪里有诗人的足迹，哪里便升起新生活的歌声。因为诗人们坚持深入生活，从生活出发进行诗歌创作，所以大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五四”以来新诗的题材领域，广阔地反映了新时代丰富多采的生活。纵如新中国成长发展的历史进程，横如从国家的重大事件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从革命到建设，

从工厂到农村，从矿山到海港，从森林到草原，从祖国的心脏到祖国的边疆，都在诗歌中得到历历如绘、色彩绚烂的表现。可以说从当代诗歌反映生活的广度来看，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诗歌。

而且应当看到，众多的当代诗歌还能够把生活描绘的具体性和艺术形象的概括性较好地统一起来，在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很多诗歌通过各种生活、人物、情思的真实抒写，生动地展示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巨大深刻的变革，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奋斗和辉煌成就，讴歌了当家做主的人民大众在革命和建设焕发出来的劳动热情和英雄气概，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和光明美好的生活本质。这种既充满生活气息又富于时代特征的诗歌，正是诗人们坚持深入生活、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的成果。很难设想，假如闻捷离开在新疆时期细致的生活体验，他能写出那些歌唱新疆各民族生活的优美动人的诗篇；假如傅仇没有深入林场，他能唱出那些富有特色的伐木工人之歌；假如公刘、李瑛、雁翼等没有长期同解放军战斗在一起，他们能那么细腻入微地传达出部队生活的脉搏。这是不言而喻的，诗人离开生活，离开沸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离开人民群众的心灵呼吸，便是失去了创作的源泉，诗歌之花便会枯萎。“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历史反复向我们昭示的诗歌艺术的根本规律。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正是在这个根本规律上显示出它那不可磨灭的真理性。

我们说新中国头十七年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坚持了诗与生活密切联系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并不是说它在这方面没有

缺点或偏向。由于对诗反映生活的方式在认识上存在片面性，五十年代不少诗歌曾出现“过实”的现象。当然诗歌可以直接描写生活场面和刻画人物形象，这也是诗反映生活的一种方式。不过那时有些诗歌仅止于生活现象的摹写和人物经历的平铺直叙，没有言外之旨和画外之意，缺乏深刻的艺术概括力，因而一览无余，不能给读者留下咀嚼的余味，不能引起读者更多的想象和遐思。更有甚者，是将诗歌再现客观生活和表现主观感情对立起来，把直接描绘现实生活当作诗反映生活的唯一方式。这样不但妨碍诗人把自己对生活独特的感受、思考和评价倾注于艺术的构思之中，使那些再现生活的诗篇缺乏内在的激情，而且把那些着重倾吐诗人对生活的情思、抒发外在世界在内心世界引起的种种感应的表现方式排除在革命现实主义之外。这就既影响了诗歌向生活的深度开掘，又堵塞了诗歌反映时代的多种渠道。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问题又走向另一极端，诗歌创作出现了“过虚”的现象。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等等错综复杂的影响，不少人强调诗歌应“虚实结合”，实则“虚实脱节”。有些诗作把生活现象任意拔高，从中引申出与形象缺乏内在必然联系的豪言壮语，以诗来注解某些流行的政治极念，从而削弱以至破坏了诗歌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不论是纯客观的描摹生活现象，还是抒写感情的主观随意性，并非革命现实主义本身的弊病，而恰恰都是违背革命现实主义原则的结果。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有其反映生活的独特艺术规律。它反对“过实”，也反对“过虚”；它反对表面化地临摹生活现象，也反对缺乏生活根据地抒发主观感情；它反对亦步亦趋地记录生活，也反对天马行空式的胡思乱想；它赞成再现，也主张表现；它

强调生活描写的具体性和真实性，也容许对生活作夸张的以至变形的反映；它否认反映生活方式的单一性，提倡用多样化的方式反映生活。我国当代诗歌创作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了革命现实主义是足以促进诗歌广泛深入而又多样化地反映时代生活的正确创作原则。

不但坚持诗歌应该反映生活，而且强调诗歌应该对生活发挥能动的改造作用，这也是新中国头十七年诗歌创作所提供的另一宝贵经验。诗歌要不要为改进生活服务，要不要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也是诗歌创作中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从诗的历史来看，凡是进步的、革命的诗人 and 评论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法国杰出的诗人雨果曾说：“有益于祖国或革命不会给诗歌带来任何损失。”英国杰出的诗人雪莱也说：“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俄国伟大的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美学的高度明确指出：“艺术也应该为某种重大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无聊的消遣服务。”我国清代的薛雪也在《一瓢诗话》中就此问题发表过自己的见解：“诗不可无为而作，试看古人好诗，岂有无为而作者？无为而作者，必不是好诗。”因此，我国当代诗歌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是继承了中外诗歌包括“五四”以来新诗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是合乎诗歌艺术本身规律的一种必然要求。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我国广大的诗人注意从亿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活和斗争中汲取诗情，通过典型的艺术图画，表现新生活和新人物的美，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读者，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和促进了社会生

活的发展。象郭小川写于五十年代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名篇传诵一时，贺敬之写于六十年代的《雷锋之歌》、《回答今日的世界》等佳作激起千百万人心灵的回响，都是诗歌对生活发生积极影响的典型例证。

诗应对社会生活发挥积极影响和能动作用，这个原则无疑是对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在如何贯彻这个创作原则的问题上却发生了不少弊病。一个就是诗歌和政治的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人民政权建立以后，我国人民在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上广泛地组织起来，大家都在革命的政治原则指导之下进行工作和斗争，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极大地加强了，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诗人不应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且一些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着意于表现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力求从政治的角度去解释和评价社会生活，强调通过诗歌艺术去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这也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在于当时存在着一种对诗歌和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的理解。“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就是这种观点的集中表现。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使不少人产生这样一个错觉：似乎诗歌必须围绕着政治转，必须直接服从于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以至某项具体的政策和任务，而一切生活现象都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来加以解释，这样就把诗歌创作赶进狭窄的胡同，而失去了它那本应无限宽广的生活天地。在这种情况下，“写中心，唱中心”的口号一度流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弊端也在诗歌创作中发生了不良影响，这些都曾经束缚了许多诗人的手脚，挫伤了不少诗人的积极性，造成诗歌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使诗

以之为生命的真实性失去广大读者的信任。与此相关的是，造成了诗歌题材问题上的混乱。诗的题材当然有大小之分，主次之别，某些诗人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力求表现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包括政治斗争的重大题材），以强烈地表现时代精神，这原是完全可以和应当提倡的。不过问题是在一段时间内却把重大题材搞成了唯一提倡甚至是唯一容许的，不管诗人的具体情况如何一律要求他们去表现重大题材。似乎非如此就不算“从属于政治”，非如此就不能使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生活中其它方面的多种多样的题材遭到冷落，甚至将它们排斥到革命现实主义的轨道之外，这样就造成了一花独放的单调局面，严重地束缚了我国社会主义诗歌的生产力，完全违背了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

同对诗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有联系的，是当时对诗在生活中的作用也有一种简单化的认识。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它的主要作用应是通过富于美感的形式，进行情绪感染和思想启迪，净化和美化心灵，从道德情操上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不言而喻，能引起人们快感的东西是各式各样的，能对生活有帮助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譬如说，歌颂生活中美的东西可以有益于生活，暴露生活中丑的事物也同样可以有益于生活。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许多人却没有这样来认识和理解问题。在那个时期，我们提倡歌颂新生活，颂歌成为新中国头十七年特别是头十年中的主调，这是可以理解而无可非议的。一个长期遭受压迫的国度，几

万万曾被奴役的人民，一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立了起来，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而且逐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自然会激发诗人的欢欣鼓舞之心，引起他们的歌颂之情。很多诗人满怀真挚的感情，歌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的确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心，鼓舞了人民建设新社会的斗争勇气和革命热情，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生了良好的作用。这在当时不仅是必要的，即使在现在和将来也是应该坚持的。至于在当时一部分颂歌中，曾经留下了个人崇拜的痕迹和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也出现过一些不够真实的东西，确实应该引以为鉴戒，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切莫泼污水连婴儿也倒出去。问题倒是在于当时不少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认识得过于简单，因而对于诗歌的作用理解得过于片面。似乎社会主义的诗歌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只有歌颂生活中的美才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而暴露生活里的丑则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样就使得不少人只能用一只眼睛片面地看生活，而不能用两只眼睛全面地看生活，因而影响到诗歌反映生活的深刻性，也削弱了诗歌在生活中的战斗作用。把歌颂和暴露如此绝对地对立起来，就造成了诗歌只报喜不报忧的局面，甚至把一些真实地暴露了生活中那种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落后的、丑恶的事物的诗篇（包括诗人）错误地打入冷宫。这种痛苦的历史教训应当牢牢记住。当然我们应当正确地识别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支流，歌颂和暴露在当今的诗歌领域中所占的比重应有主次之别，但两者无疑都需要，它们都可从各自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这却是我们应当长期坚持的一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我觉

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下述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作家必须了解一切——生活的整个巨流，巨流的一切细流，现实的一切矛盾，它的悲剧和喜剧，它的英雄主义和卑俗性，虚伪和真实。作家应该认识到，任何现象无论是多么微小或无关重要，它不是正在崩溃的旧世界的碎片，就是新世界的幼芽。”

二

诗人和人民的关系，是同诗与生活的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把诗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原则同诗人与人民紧密结合的原则统一起来，正是我国当代诗歌十分宝贵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诗人们无不是通过各种各样深入生活的方式，熟悉和了解人民，同人民生活、劳动、战斗在一起，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逐步在思想感情上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同人民保持血肉的联系中，诗人不但取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而且逐步创造出适合人民大众需要的创作主体。这几乎是当代许多优秀诗人共同的体会，也是他们的诗歌创作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诗人艾青曾从诗歌美学上指出：“诗人是否能在最先进的人们当中去吸取自己的营养，使最先进的思想感情成为自己的精神力量，再以这种精神力量去感动千百万人们；这就是他的创作能不能教育千百万人们的关键。”诗人雁翼也曾这样谈过他的创作体会：“在接受和积累人民斗争生活给予你感受的同时，来洗涤、塑造自己的灵魂。”诗人贺敬之还曾从社会主义诗歌特征的高度，概括了我国当代杰出诗人郭小川的艺术经验：“作为社会主义的新诗歌，郭

小川向它提供的足以表明其根本特征的那些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这就是：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社会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如此等等。——正是在这些根本点上，诗人郭小川用他的全部创作实践和整个一生，作出了有力的回答。”从这些著名诗人根据他们丰富的生活和艺术实践所作的理论说明，我们不难看出：诗歌属于人民。诗人在同人民的密切结合中，吸取人民的营养哺育自己的灵魂，而又以充满人民感情的诗篇去教育和提高人民。这是为社会主义诗歌的性质所决定和要求的，也是诗歌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从新中国头十七年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诗应当表现人民，应当为人民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问题是发生在诗如何表现人民、如何为人民服务上，这方面确有不少历史教训值得总结。看来问题的症结是对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理解有误和处理失当。

一个是抒人民之情和表现诗人个人感情的关系问题。五十年代曾经提出过“抒人民之情”的口号，作为社会主义诗歌的一个创作原则，这个口号对于促使诗人深入生活和接近群众，引导诗人扩大生活视野和提高思想境界，鼓励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利益和愿望，都起过良好的作用。“抒人民之情”这个口号本是就诗人和人民的关系而提出的一般创作原则，可是后来却被许多人误解成诗歌艺术的具体表现方法。特别是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有些人更是把在诗歌创作中抒人民之情和表现诗人的个人感

情当作是互相排斥的绝对对立的关系。这就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许多优秀诗人譬如艾青、贺敬之、郭小川、公刘等等，他们那些表现个人真情实感的作品，真挚地袒露主观精神世界的诗篇，却遭到不应有的指责以至批判，就是在这种错误观点的支配下发生的。风气所及，诗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创造精神受到阻碍，个性消溶于一般原则之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从许多诗里消逝了，甚至连“我”字也不敢在诗中无所顾忌地出现了。其实，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明确指出过：“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通过个性而表现共性，通过表现诗人的个人感情而反映人民的感情，这是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离开个性，共性何由存在；离开诗人的个人感情，人民的感情又从何体现呢？把个性和共性对立起来，根本无法真实地、具体地、生动地表现出人民的感情，只能造成公式化、极念化、虚假矫饰的东西，那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诗了。当然，诗人个人感情的性质千差万别，深浅高下也不一致，不能反过来说诗人表现了自己就是表现了人民。歌德说得好：“要是他只能表达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不过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不是要诗人在诗歌中回避自己、掩饰自己，甚至伪造自己的感情，而是希望诗人在创作准备中，在生活实践中，真正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断扩大自己的心胸，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这样在进入具体创作时就有了充实的基础和正确的前提。我想我国宋代大诗人陆游所说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恐怕就是这个意思。而在诗歌的具体

艺术表现中，则仍然要坚持通过个人感情反映人民感情的方法。只要诗人在生活实践中真正在感情上同人民打成了一片，那么他在艺术实践中所具体表现的个人感情自然就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感情。就象鲁迅称赞高尔基时所说的那样：他本身就是大众的一体，自然他个人的喜怒哀乐就无不与大众相通了。

另一个问题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诗歌创作和表现诗人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认识和见解的关系。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诗歌创作当然无例外地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检验的普遍真理作为指导思想。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诗人在观察生活和进行艺术实践时便会陷入盲目的不自觉的状态，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纷纭万状的现实生活的主流和本质，不可能清醒地把握时代历史的动向和规律。我国当代许多优秀的诗人正是由于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地增强了认识生活的能力和提高了诗歌创作的思想水平。然而，我们强调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诗歌创作，并不是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某种固定不变的教条来任意地剪裁生活，用生活事例来印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结论，更不是违背艺术规律地要求诗人用形象来注释和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

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普列汉诺夫也说过：“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艺术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会大大地增强，只是必须使这些思想成为他的血肉，使得他正象一个艺术家那样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了解，所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诗歌创作，就是要求诗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分析生活现象，从实践中去掌握生活的真理，并且把这种对于真理的认识渗透在提炼和概括生活素材的艺术构思中，有血有肉地表现出来。在这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诗歌创作和表现诗人对生活独到的感受、认识和见解，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对立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程度越高，诗人对生活的观察就越具有真知灼见，诗歌作品也越具有思想深度。生活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应随着生活而发展，真理不可能穷尽。如果诗人能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独立地、忠实地、创造性地研究和反映日新月异的生活，那么他通过艺术表现出来的生活底蕴，还会反过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理论家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我国当代许多优秀诗人的实践不是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吗？很遗憾，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人们并没有这样来正确地认识问题，不是有许多诗人因为勇于表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光照下对于生活的独立见解而曾受到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和挞伐吗？结果造成了不少诗人安于思想平庸的状况，大大影响了我国当代诗歌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我们希望这种曲折在今后不要再重复。

还有一个问题是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时代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人民群众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照耀下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今的生活面貌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同旧时代相比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当然会具有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崭新的时代风格。我们只要把一些老诗人（如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冯至等等）解放前后的诗作比较一下，便不难察觉他们的艺术风格所显示的时代色泽的巨大变化。然而应当注意，我们时代的风格虽有其确定的含义，但就象我们的时代生活绚烂多姿一样，它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多侧面的概念。雄伟壮丽是我们时代的风格，轻快优美又何尝不是；云蒸霞蔚是我们生活的色泽，弄月光风也不能说不是；豪迈乐观是我们现实的音调，深沉严峻也同样是它的回响。我们绝不能对时代风格作狭隘的理解，如过去有一个时期曾经做过的那样，这样势必把本来属于我们时代的东西排除在社会主义诗歌领域之外，从而造成诗的色泽和音响的单调化。

特别应当注意，丰富多采的时代风格反映到各个诗人创作上更是千姿百态的。每个诗人的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审美趣味、品格才能各有不同，因此必然各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方法去显现时代风格的各种折光的。当代许多优秀诗人不正是各以自己独特的声音才组成了我们时代灿烂辉煌的交响乐么！倘若要求所有的人一律都吹长笛，或是都敲大鼓，而把小提琴、大提琴、黑管等等都打入另册，那还成什么交响乐呢！固然我们这是极而言之，但是过去在某些时候不也确曾发生过类乎此的情况么？我想大家不会忘记艾青、闻捷、严阵以至郭小川等曾